

我们的内心 冲突

(美) 卡伦·霍尔奈著
王轶梅等译

当代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Our Inner
Conflicts



上海文艺出版社

Our Inner Conflicts

当代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上海文艺出版社

我们的内心冲突

(美) 卡伦·霍尔奈 著
王轶梅 等译

责任编辑：夏青根

封面设计：王志伟

Our Inner Conflicts

Copyright © 1945 by Karen Horney

Translation © 1998 by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in association wit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当代精神分析经典译丛

我们的内心冲突

[美]卡伦·霍尔奈 著

王轶梅等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港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75 插页 2 字数 147,000

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BN 7-5321-1801-0/B·13 定价：10.00元

鸣 谢

Publication of this book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generous sup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Karen Horney Society, Bernard J. Paris, Ph.D., Founder and Director, and Helen A. De Rosis, M.D., Co-funder, and of the Karen Horney Clinic, Henry Paul, M.D., Executive Director.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际卡伦·霍尔奈协会创办人兼主任伯纳德·J·派里斯博士、共同创办人海伦·A·德罗西斯博士以及卡伦·霍尔奈诊所执行主任亨利·保罗博士的慷慨帮助,谨致谢忱。

上海文艺出版社

前 言

本书致力于研究精神分析领域的进展,其内容来自于我对病人及我自己的分析经验。该理论已问世并发展了若干年了,但直到我在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的赞助下进行一系列讲座的准备时,我的思想才最后定形。其中的第一部分,集中于该主题的技术层面,被冠名为《精神分析的技术问题》(1943年);第二部分,其内容涵盖了我们这里所要处理的问题,为《人格的整合》,发表于1944年;其他精选的主题——《精神分析疗法中的人格整合》、《超然心理学》以及《施虐倾向的内涵》都分别在医学学会以及精神分析促进协会上宣读。

我希望本书将有助于那些对完善我们的精神分析理论和疗法有浓厚兴趣的分析学家的工作,我还希望本书提出的观点不仅对他们治疗病人有益,而且能运用于他们自身。精神分析领域的进展只能通过艰难的跋涉来获得,其中包括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及解决面临的困难。如果我们停滞不前不愿变化,我们的理论就会受到束缚变得贫乏而教条。

我确信,无论如何,任何对纯粹的技术范畴或抽象的心理学理论有所突破的著作,对那些想探究自身并一直坚持于自我发

展的人都将是有意义的。我们大多数生活在这个艰难人世中的人都被本书所描述的冲突所纠缠,需要我们的帮助。虽然严重的神经症应由专家去解决,我仍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我们自己将逐步解决我们内在的冲突。

我首先得感谢我的病人们,是他们让我在工作中对神经症有了较深刻的认识。我还得感谢我的同事们,无论年长还是年幼,我都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了参考和借鉴,他们的关注和理解支持并促进了我的工作。在我进修的学院里,活跃的学术讨论总是激发人的思维,是那么富有成效。

我要感谢三位精神分析领域以外的人士,他们以其特殊的方式支持推进了我的工作。埃尔温·约翰逊博士,他让我有机会在“社会研究新流派”上提出我的观点,而其时经典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是唯一被认可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实践的流派。我尤其要感谢克劳拉·梅耶,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哲学和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她一直关心帮助我,年复一年地与我就我分析工作中产生的每一个新发现进行探讨。还有我的出版商 W.W. 诺顿,他们有益的建议为我的著作增色不少。最后但并不是无关紧要的是我要感谢米尼特·库伦,他帮助我更好地组织材料并更加清晰地阐述了我的思想。

序

无论出发点如何,不管道路多么曲折,我们最终必须找到引发心理疾病的人格障碍,在这点上几乎所有心理学发现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因此,这只是一个重新发现。各个时代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平静的、心态平衡的人不会成为心理失衡的受害者,受害者只能是那些为内在冲突所撕裂的人。用现代术语来说,每一例神经症,无论其症状表现如何,都是一个性格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和治疗上必须努力探索以较好地认识神经症患者的性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伟大的开拓性工作也逐渐汇聚到这一概念上——虽然他开创性的研究方法并没能使他对此进行清晰系统的阐述,但那些继承和发展了他的研究的人——著名的如弗朗兹·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海姆·里奇,以及哈罗德·舒尔茨-亨克等对其更明确地下了定义。然而,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揭示了这一性格结构的确切性质和原动力。

我本人的出发点则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的假定使我文化因素的作用产生了思索,它们对我们关于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构成方面的观念的影响是明显的,而且明显地

由于弗洛伊德忽视了文化因素，他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我对此问题的兴趣历经了十五年的一个过程，这一兴趣的进一步加深，部分源于与埃利希·弗洛姆的交往，借助其渊博的社会学和精神分析学识，我更加认识到社会因素有着超越其在女性心理学研究方面局限作用的更为广泛深远的意义。我的这些感想在1932年我来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当时我发现美国人的心理状态与神经症表现与我在欧洲国家所观察到的有许多不同，而这只有文化的差异可以说明。最近我在《当代的神经质人格》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是神经症是由文化因素引起的。这就明确说明了，神经症产生于人际关系的障碍。

在我撰写《神经质人格》之前，我是沿着另一条从起初的假定合乎逻辑地进行推理的思路进行研究的，其主题是神经症的驱动力。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这些驱动力的强迫性特征。他认为这些驱动力是天性中的本能，其目标是渴望满足及不能容忍挫折。因而他相信，这不仅存在于神经症患者，而且对所有人都起作用。然而，如果神经症是紊乱的人际关系的结果，这一假定可能就站不住脚。我在这方面得出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这些。很明确，强迫性的动力是神经质的；他们生来就感觉孤独、无助、恐惧并怀有敌意，并且尽管有这些感觉，他们仍主张妥善地与外界相处。他们的目标首要的不是满足而是安全；他们强迫性的性格要归因于隐藏在内心的渴望。这些动力因素中的两个——神经质的对情感和权力的渴望——一开始就清晰地凸现出来，这在《神经质人格》中有详细的描述。

虽然我一直认可我所认为的弗洛伊德学说的基本原则，但那时我已认识到寻求更恰当的对神经症的认识已导致我走上了与弗洛伊德并不一致的道路。如果如此众多的被弗洛伊德认为

是出于本能的因素都的确具有文化上的色彩,如果弗洛伊德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性欲的因素只是一种由渴望以及与他人交往中的安全感等目的所激起的神经质的对情感的需求,那么性欲理论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童年的经历是重要的,但其对我们一生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施加影响的,其他理论上的差异也就不可避免地随之而来。因此,有必要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系统阐述有关我对弗洛伊德学说的立场,其结果就是《精神分析新法》的出版。

与此同时,我对神经症的驱动力的研究也在继续进行。我称这种强迫性的力量为神经质倾向,并在我的下一部书中描述了其中十个人的有关情况。那时,我也已认识到神经质性格结构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当时我把它看作是一个由许多互相影响的微观小世界构成的客观世界,其核心存在着神经质的倾向。如果精神分析根本不包含我们目前的困境与过去经历的联系而仅依赖对当前人格中动力因素的相互影响的认识,那么认识和改变我们自身或专门的治疗帮助都是不可能的。基于对心理治疗的广泛需求而缺乏有效帮助的事实,自我分析似乎可提供填补这一重要需求的希望。因为该书的主要内容是有关对自我进行分析的可能性、局限性及其方法,我把它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我对自己有关个体倾向的描述并不十分满意,它们本身已被精确地描述过了,但我的思绪总被这样一种感觉所萦绕,即以列举的方式进行描述使它们显得彼此孤立。我可以看到对情感、强制性的谦逊的神经质的需求,以及对“伙伴”的需求互为归属。我当时没能看出的是它们一起代表了一种对待他人以及自我的基本态度,一种特别的生活哲学。这些心理倾向是现在被我综合成“趋众”心理的核心。我还发现,强制性的对权力和

威望的渴望以及神经质的野心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它们大致是构成我称之为“逆众”心理的因素。但是对赞美的需求以及追求尽善尽美的动力，虽然具有神经质倾向的所有特征，并影响与他人的神经质的关系，却似乎主要影响人与自身的关系。同样，探究事物的需求的影响力似乎既比不上对情感的需求也比不上对权力的需求。它似乎不是一个独立的本质性实体而是从某些更大整体中分离出来的。

我的分析从那时起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随后的若干年里，我的兴趣的焦点转向冲突在神经症中所起的作用。我在《神经质人格》中已说过神经症产生于相互歧异的神经质倾向的冲突。在《自我分析》中我说过神经质倾向不仅相互加强且会产生冲突。不过，冲突仍被视为次要的问题。弗洛伊德渐渐地意识到内在冲突的重要性，然而只把它们当作被抑制与抑制性的力量之间的冲突。我开始发现的冲突却有所不同，它们在相互对立的神经质倾向之间起作用。虽然它们最初只影响对待他人的相互对立的心理状态，但最后又包含了对待自我的相互对立的态度、相互对立的本性以及相互对立的价值取向。

观察研究的深入使我认识到上述内在冲突的重要意义。我所受到的最强有力的冲击首次是来自于患者对他们内心明显的对立视而不见的现象。当我向他们指出时，他们变得躲躲闪闪似乎毫无兴趣。在多次这种经历之后，我认识到他们这种回避表达了一种对抓住这些矛盾的极度反感。最终，我对冲突的认识豁然开朗，我认识到我正在接触爆炸性的事物。病人们完全有理由回避这些冲突：他们担心其所具有的力量会把他们撕得粉碎。

这样我开始理解为何人们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智慧来或

多或少孤注一掷地努力“解决”^①冲突,或更准确地说是否认其存在并创造出一种伪和谐。我在书中描述了按顺序排列的四种主要的解决尝试。最初的尝试是淡化部分冲突然后将其与冲突的主要部分对立起来。第二步是“远离人群”。这里神经质的超然的作用是以新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超然的心态是基本的冲突的一部分——也即,是一种原始的对他人的抵触性的心理状态,也代表了解决冲突的尝试,因为保持自我与他人之间一段情感上的距离将使冲突不起作用。第三步尝试则有很大的不同,不是远离他人,而是神经质的离开自己。他的整个现实的自我让他觉得有些不真实,他创造了一个理想化自我形象,其中抵触性的部分是如此地被美化以至于其不再表现为冲突而呈现出一副丰富多彩的个性多样的面貌。这个观点有助于阐明迄今许多我们尚未明了的有关神经质的以及由此在治疗方面存在的问题,它还将两个先前相互抵触相互排斥的神经质的心理倾向恰当地进行了安排。对尽善尽美的需求现在就表现为一种获得这种理想化形象的努力;而对受别人赞美的渴望可能被视为是患者需要外界认可他确实就是那个理想化形象。而且这个形象越是远离现实,患者这种需求在逻辑上就必然越难以满足。在解决冲突的各种努力中,理想化形象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因为其对整个人格有深远的影响。但反过来,它又导致了新的内在分裂,并由此又要求进一步的弥合。第四个解决冲突的尝试主要是企图消除这个新的分裂,虽然它有助于迅速而神秘地消解所有其他的冲突。通过我所说的外表化过程,内在的心理过程可以像发生在自我以外的那样被感受到。如果理想化形象意味着从实际的

① 参见第 10 页脚注。

自我向外迈出了一步，外表化就代表了一个更加根本的分离，它又会产生新的冲突，或更剧烈地增大最初的冲突——介于自我与外部世界之间。

我之所以称它们为主要的四种解决冲突的尝试，部分是因为它们在所有的神经症中都有规律地起作用——虽然程度不同，部分还因为它们造成了人格上深刻的变化。但它们决不是仅有的解决尝试，其他相对次要的包括专横的必须策略，其主要功能是消除所有内心的疑惑；严格的自我控制，通过纯粹的意志力量来把撕裂的个性结合起来；愤世嫉俗，通过轻贱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来消除一切有关理想的冲突。

同时，所有这些未被解决的冲突的后果在我面前也逐渐清晰起来。我看到种种恐惧的产生、精力的浪费、对个性完整不可避免的损害、被妄想引发的深深的绝望感所缠绕而不能自拔。

直到我掌握了神经质的绝望心理的重要意义时，施虐倾向的意义才显现出来。这些心理代表着通过替代性的生活来恢复原状的努力，并为一个对曾经的自我感到绝望的人所拥有。而且这种常可以在施虐狂追求的对象身上观察到的毁灭一切的激情产生于其对惩罚别人所得到的成功的狂喜的不能满足的需求。很清楚，这种危害性的追求事实上并不是什么孤立的神经质倾向，而只不过是一种更具综合性的整体——因为缺乏更好的表达方法，我们姑且称之为施虐狂的永不言败的表达罢。

如此，一个有关神经症的理论逐渐形成了。其动力中心是介于“趋众”、“逆众”以及“离众”之间的基本冲突。一方面出于其对个性被分离的恐惧，另一方面出于个性应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需要，神经症患者就会孤注一掷努力寻求解脱。当他成功地以这种方式创造出一种人为的平衡时，新的冲突就会持

续地产生从而需要进一步的补救措施来加以平息。这场力争使个性完整的战斗中的每一步都会使神经症患者更具敌意、更感无助、更恐惧、更疏远自我与他人,其结果就是使冲突的困境变得更加严重而真正的解决越来越遥不可及。他最终将变得绝望并可能试图从其施虐对象身上寻求某种慰藉,而这反过来又会加剧其绝望感并产生新的心理冲突。

这是一幅有关神经症发展及其造成的性格结构的相当阴郁的画面,然而我为何将我的理论称为建设性的呢?首先该理论抛弃了一直延续的不现实的乐观主义思想,即荒谬地认为我们能以简单的方法治愈神经症,但它也并不等同于悲观主义。我称其为建设性的是因为它使我们第一次可以处理并消解神经患者的绝望心态。我称之为建设性的最主要的原因除了对其心理纠缠的严重性的认识,还因为它不仅使我们可以减缓潜在的冲突而且确实可对其进行消解,并且使我们能通过努力使人格真正地得到整合。神经症患者的内在心理冲突不能通过理性的决心来解决,患者自身的解决尝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但我们可通过改变造成他们目前状况的人格的内环境来解决这些内在冲突。每一项有效完成的精神分析工作都会改变这些环境因素,从而使一个人的无助、恐惧、敌意以及对自身及他人的疏远状况都有所好转。

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及其治疗的悲观思想源于其对人性善的一面及人的发展的深深怀疑,他是以人类注定要承受痛苦或毁灭自身为出发点的,人类的这一天性使得其只能被控制,或充其量被“升华”。我的信条却是人类有能力也有愿望开发自己的潜力并成为一个人健全的人,而如果与他人进而与自身的关系被扰乱并持续地紊乱下去,这一切将会变质。我相信只要人类生

存下去,他就能改变并不断处在进化之中,这种信念随着对人性理解的逐渐加深而得到增强。

中文版前言

卡伦·霍尔奈(1885—1952)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分析思想家之一。她曾在格廷根的弗赖堡大学和柏林研究医学,1910年开始与卡尔·亚伯拉罕共同从事精神分析,并成为于1920年建立的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创始人之一。20年代至30年代初,她在固守传统理论框架的同时,开始尝试修正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心理学的观点。她的论文因远远超越了时代而未得到应有的注意,但自1967年《女性心理学》重版后,卡伦·霍尔奈已被公认为首位伟大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者。

1932年,霍尔奈接受弗兰茨·亚历山大邀请,到新成立的芝加哥精神分析研究所担任副主任。1934年迁往纽约,加盟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期间,她受到美国新的知识与社会思潮的影响,出版了两本著作——《当代的神经质人格》(1937)和《精神分析新法》(1939)。书中摒弃了一些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前提,不再强调其理论的生物学取向,而以文化、人际关系的强调取而代之。这些书大大惹恼了霍尔奈正统保守的同事们,她被迫辞职,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在她思想的第二阶段,霍氏与同为新弗洛伊德主义者的哈里·斯达克·沙利文、埃利希·弗洛姆、克

拉拉·汤普森、亚伯拉罕·卡迪纳合作进行“文化学派”的精神分析。

离开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后,霍尔奈于1941年创建美国精神分析研究所,并在此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发展了她的“成熟理论”。在《自我分析》(1942)、《我们的内心冲突》(1945)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中,她提出人们为解决因感到不安全、不被喜爱、无价值而产生的焦虑,否认自己的真实情感,精心设计出防卫策略,这种策略既是人际的,又是心理内部的。

卡伦·霍尔奈的思想演变可分为数个阶段,因此她对不同人有着不同的意义。有人认为她首先是位在反弗洛伊德女性心理学观点的运动中起重大推动作用的女性,另一些人认为她是新弗洛伊德主义“文化学派”的一员,还有一些人则以为她的主要成就在于“成熟理论”,该学说完善了防卫策略的复杂分类。尽管霍氏思想的每一阶段都很重要,我觉得成熟理论代表了她对精神分析学说的最大贡献。她早期的大多数观点已被她本人或别人修订、丰富;另一些则被后人重新发现、吸收。《我们的内心冲突》和《神经症与人的成长》对人类行为中现存的内心冲突及防卫情意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有力解释。这不仅在临床实践上,而且在文学、文化、政治心理学、哲学、宗教、传记、性别等领域的工作中都有巨大的价值。

1. 霍尔奈与女性心理学

当霍尔奈还是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一名讲授正统理论的教师时,她开始反驳弗洛伊德关于阴茎嫉妒、女性受虐狂和女性发展的学说,并试图用站在女性立场的观点去取代当时流行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女性心理学观。虽然起初她尝试从内部去修正精

神分析学说,最终她还是向这一学说的许多前提条件提出挑战,继而发展了她自己的理论。

在霍尔奈最早的两篇女性心理学论文——《论女性阉割情结的起源》(1923)和《逃离女性身分》(1926)中,她努力说明女孩与妇女有固定的生理构造和成长方式,应从女性的角度去理解它,而非仅仅从她们不同于男子且认定她们劣于男子之处来考虑。她指出,精神分析学说之所以认为妇女是有缺陷的男子,是因为该学说乃一位男性天才(弗洛伊德)和一个男权统治社会的产物。如果精神分析学说只从男性视角看女性,就不能说它是对妇女天性本质的科学描绘。霍尔奈的疑问是:男子为什么会这样看待妇女?她认为,男子对于怀孕、生产、母亲身分、乳房以及吮吸的嫉妒,使他们无意识中产生贬低妇女的倾向;男子对富创造性工作的冲动是他们对自己在繁衍后代工作中所起微小作用的过度补偿。男子“子宫嫉妒”一定比所谓的女性“阴茎嫉妒”更强烈,因为男性需要贬低女性更甚于女性贬低男性的需要。

后来的论文中,霍尔奈继续分析男性的妇女观,暴露其缺乏科学依据之处。在《两性之间的不信任》(1931)中,她提出妇女被视作“二等入”,因为“在任何时代,强大的一方会创造有助于保持它地位的意识形态”,且“在此意识形态下,弱方与强方的不同之处被解释成为劣处”。《害怕女人》一文将男子对妇女的恐惧追溯至男孩害怕自己的生殖器无法胜任与母亲的关系。来自女性的威胁并非阉割,而是羞辱,是对他“男性自尊”的威胁。长大后,男性始终有深深隐藏的关于他阴茎大小或性能力的焦虑。女性身上却没有对应的焦虑。她“只按照存在的方式去扮演角色”,不被强迫去不断证明女性身分。因此也就不存在相应的女性对男性的恐惧。男性应付这种焦虑的对策是树立“有效率”的